

山西一直是乡土文学重镇,涌现出许多以土地和人民为创作根基的优秀作家,本版《一笔一画为人民》中的马烽便是杰出代表之一;《书写新乡村 作家宜先变》《新时代山乡巨变的诗意所在》两文则从不同维度,就乡土文学的求变求新进行了探索。这些或许能对如何发扬山西文学优良传统、推动乡土文学书写新篇章有所裨益。

——编者

书写新时代的山乡巨变,要义在“变”。那么,今天来书写中国农村的历史巨变,还能用过去的观念、态度 and 方式来对待吗?不能。这就要求作家首先要自身求变。至少在三个方面,作家亟待转变。

实现态度的根本转变

必须正视一个基本前提:大多数当代作家对乡村的态度是复杂乃至矛盾的。尽管我们有不少作家来自乡村,或在乡村生活、工作过,但主要生活和工作环境却是远离乡村的,与乡村是比较隔膜的。我们许多作家及艺术家并不真正了解乡村、理解乡间人民的奋斗和追求。在真正进入创作之前,作家首先要转变从上面、外面观看乡村的态度,沉下来、走进去,切实把握新时代山乡跃动的脉搏,全面认识当今“三农”的实际状况。

很显然,当今的农民大多受过中等以上的教育,生活在信息时代,眼界更开阔,思想更活跃,能力也大为增长。别说与闰土们完全不同,就是与梁生宝、孙少安等也有很大差别。我们的作家,务必要走进他们的心中,切实体会和感受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同时,对农民兄弟的苦恼和艰辛,作家们不能视而不见、漠不关心。应该以我们的智慧才能和特有方式,帮助他们破除困惑,克服困难。

先贤们曾为我们提供了范例。赵树理、孙犁、柳青、周立波、浩然等,他们或长年扎根农村,或隔三岔五去乡间生活一段,与农民朋友交流交心,为他们排忧解难。农民兄弟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自然就成为他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他们的诚挚态度、务实精神、宝贵经验,

作为一名孔孟之乡的文化工作者和作家,我的写作一直是从《诗经》《春秋》《左传》等中华文化原典中寻找民族文化的根脉,在浩瀚的历史风云中发现代表中华文化的人物和故事,深入研究,深度开掘,用长篇历史文学作品形式展示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回顾多年的创作历程,我有以下做法和体会:

一是回到中华文化和文学的源头,找到我们民族文化的根。我多年从事文物保护和孔子文化的传承工作,对儒家文化有很深的了解。孔子编订《春秋》,说:“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载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我接续他的思想,创作出版了《鲁国春秋》,让读者了解了中华民族是怎样从一个事鬼敬神的民族走向敬德保民和礼乐文明的,对于中华文化正本清源有着重要意义。

二是找寻与时俱进的历史好故事,展示中华文化的巨大魅力。这些中华文化的起源、传承和复兴主题,瞄准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和家庭,写出他们弘扬中华文化的不懈努力。

三是严格历史考据,拒绝穿越、架空和戏说。我对文艺界特别是影视剧中的某些穿越、戏说和架空历史的做法深恶痛绝,认为那种胡编乱造,是作家不肯下功夫研究造成的,是对中国历史的破坏和对青少年认知的伤害。我在每一次创作之前,都要做好资料收集和史料研究工作,做足功课。在写长篇历史小说《大运河》的时候,我到汶上南旺镇的宋庄村、白庄村实地采访,人们说这两个村子的人不能结亲,是因为两个村庄的人打过硬架,有世仇。后来我查阅地方志,得知这两个村庄的人是明朝工部尚书宋礼和农民水利家白英的后裔。当年,宋礼为了清白英出山治河,与其结拜为兄弟,兄弟的后代不能结亲,所以《大运河》中就有了宋礼白英结拜兄弟、共同治河的感人故事。书籍出版后,我带领两个村庄的人,一起到大运河边共祭治河功臣,他们释却前嫌,都为祖先骄傲不已。

四是远离西方颓废的文学流派,用中国人喜闻乐见的传统方式来讲中国故事。我上世纪80年代在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对各种西方文学流派非常熟悉,也尝试过先锋派和魔幻现实主义的作文方法。但是在我开始写这些长篇历史文学作品的时候,发现用那种抽象、意识流、荒诞、悲观的西方文学流派来讲大情怀、正能量的中国故事很不合适,于是重新研读《左传》《史记》和四大名著,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自觉接续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传统。注重塑造人物,刻画人物性格,再现人物的音容笑貌,展示他们的曲折命运,体现他们的爱恨情仇。注重故事情节,挖掘出历史故事本身的曲折和张力,让故事高潮迭起。突出重点,在展示主要人物价值观和精神追求的地方用力去写,使人物跃然纸上,光彩照人。

书写新乡村 作家宜先变

朱辉军

今天依然值得我们作家认真学习和吸取。

以全新观念表现山乡

今日中国农村,从外在面貌到内在结构,从社会定位到发展路径,都与过去有质的变化。在关涉当代中国乡村的思想观念上,我们不能停留在20世纪的认识水平,必须改变、拓展和提升我们的思想意识。

中国农村的全面振兴和迈向现代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属于基本盘的方面。广大作家因此一定要树立大历史观,从民族复兴大业这一历史高度,来认识乡村振兴的重大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关于“城乡二元结构”的破解、关于新型城镇化的布局、关于“三权分置”制度的完善、关于农民进城务工与回乡创业的分流等,都需要作家在思想上有清晰的理解和认识。不能拘囿于乡村写乡村,还要有更开阔的视野,要联系“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新发展理念,准确地把握乡村的现实坐标和发展趋向。

尤其是粮食及农产品供给与安全,我们要牢牢地并持续地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作家们对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的理解,也一定要树立这一重要观念。与之相关的,乡村全面振兴是在生态文明理念确立之后进行的,因此我们在反映新农村建设时,务必还要有生态文明的理念。

采用各种方式展现新风貌

当年恩格斯语重心长地对拉萨尔说:“古代人的性格描绘在今天是不再够用了。”面对今天日新月异的新农村,我们过去擅长的表现方式,显然也会捉襟见肘。因此也要

有所改变,采取更有成效的方式。

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的一个重要关键,是塑造生动感人的新型农民形象。当今的农村是一个开放流动的小社会。除了种地的村民外,还有往来客商、各地游客、扶贫干部、返乡青年等。作家们要广泛深入地与他们接触,了解他们的不同需求以及他们之间的各种关系,从而全面呈现出新时代农村的“众生相”。

人物形象的塑造离不开典型化。受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的影响,一些作家曾将塑造典型人物视为过时、落伍的观念和做法。其实作为“人学”的文学,其长久生命力和永恒魅力,就是塑造出具有典型性的鲜活的人物形象。就农村题材而言,二黑哥、梁生宝、李双双,甚至亭面糊、赖大嫂、梁三老汉等,都久久地活在读者的心中。这就是典型形象感染力。书写新时代的山乡巨变,一定要写出新时代乡村的典型人物。

这不是说要把某种方式、某种风格定于一尊。在文艺创作上,我们依然要坚持鼓励各种风格、各种流派争奇斗艳。当初,赵树理的“山药蛋”,周立波的“山茶花”,各领风骚;柳青的渭河平原、路遥的黄土高坡等,都体现了神州大地山乡的不同风貌。进入到我们作家笔下,也应该多姿多彩、异彩纷呈。雄伟、浓烈、刚健、奔放,与柔美、清新、隽永、含蓄,可以并存共荣,并相得益彰。严肃的正剧如《山海情》,轻松的喜剧如《暖暖的村庄》,只要真实反映了新农村的生动气象,都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青睐。

在元宇宙、大数据、云计算、多媒体的时代,作家也应该有效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与各种媒体联结融合,使自己创作的表现力、感染力和影响力不断提升。



新时代山乡巨变的诗意所在 ——长篇小说《大地之上》之精神触角

周其伦

长篇小说《大地之上》是作家王方晨的最新力作,作品生动书写了新时代“山乡巨变”后广大农民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皈依,热情洋溢地讴歌了他们勤劳朴实的品格,记录了乡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困惑,艺术地把探幽的触角深深地扎向人们精神层面最为敏感的区域,将人们生活中的琐碎心思有声有色地凸现出来,浓墨重彩地烘托出了“大地之上”万物生长的宽广意境,为当下的长篇小说创作,尤其是为同类题材的作品写作提供了一条崭新的路径。

《大地之上》发表在《中国作家》文学版2022年第3期,同时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联袂推出了单行本,其超拔的意向和丰饶的文学意味不断地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

我个人特别喜欢《大地之上》的地方,它有别于通常的乡村振兴题材,作者非常努力地拂去了生活表象的喧嚣,始终把艺术的触角直抵人心深处,很恣意地在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和凡俗的精神世界上着笔,以现实主义的小说虚构和情节搭建手法,深度描写那些被时代浪潮裹挟而离开了熟悉的家园、离开了空旷的山野,甚至离开了他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广袤大地时的惊喜和不安。将他们改变了居住环境后内心空空荡荡的忐忑与真实情态进行了惟妙惟肖的拿捏,让我们在作品中读出了一种通天接地的气象。

小说以香庄人在时代潮流的变革中离别了故园,开始过上曾经梦寐以求的城市人生活为切入点,真实地描摹了处在“山乡巨变”中的广大农民,从古老的土地上,从千百年传统落后的繁重劳作中解放出来,逐步走向更为广阔天地的生活情态,并以此作为情节上下腾挪、四处游走的抓手,惟妙惟肖地写出了朴实生活状态下的活色生香。这里有人矜持,更有生命的澎湃;这里有人质朴,更有生命的巍峨。按理说,乡民们在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和熙熙攘攘的社区里安家落户,应该是一件各方都高兴的好事,但当他们住进这崭新的高楼大厦后,才发现骨子的那种根深蒂固的生活习惯或是隐隐约约的心理期许,却远比某些浮华表面的形式转变要艰难得多,王方晨的《大地之上》就是牢牢地采用了一种真诚的语调,冷静而客观地书写着处于转型期的村民精神状态。

现代化大规模经营的“丰茂生态农业基地”的入驻,让香庄人祖祖辈辈耕种的土地改变了原来的模样,同时也带走了乡民们对土地的眷念和怀想。作品努力塑造了乡村干部李墨喜和村民二毛、江玉枝、老地丁等朴实丰满的形象,一方面勾勒了大量生动的细节来烘托出他们的赤子情怀,另一方面,也描写了“山乡巨变”后人们在新的居住地逐渐站稳脚跟,并开始融入新生活中的现实。现实中刻画的基层干部也渐渐在新的工作状态下走进了乡民的中间。小说还以找寻香庄大河

湾多年前遗失的“神石”过程作为情感主线,并用“神石”的失而复得那份欣慰来表达着乡民们内心的波动和嬗变,有情有义地烘托出在“乡村振兴”的风凰涅槃中,村民们生存状态与精神质地的洞幽烛微,人们在这个过程中交织的心理矛盾跃然纸上。

《大地之上》紧扣人性与人心这种深刻的命意,描写出当下许多乡民肝胆相照的乡土情怀,让原本一般意义上的“山乡巨变”有了发端于民间、发端于乡野的蓬勃与饱满。我特别期许王方晨在本书里成熟的书写,既有时代背景下的驳杂与宽阔,又有“人们”日常生活的具体而微。作者将这若干个层面有机地结合起来,游刃有余地写出了生活本身应有的丰沛。同时,在这部作品中,作者还很特别地采用了诗意的语调去展现广袤大地上奔腾澎湃的生命热度,颂扬了劳动者在面对新生活时的别样韵味,悲悯之中有明朗的快意,沧桑过后依然持守着朴素的一如既往,既是往昔乡土中国的写照,同时又呈现出而今乡村大地的日新月异。

我对王方晨的创作关注较多,发现他经常会给我们带来源源不断的惊喜。他的长篇小说“大地与人”三部曲《老大》《公敌》《芬芳录》和随后出版的《背后》《老实街》《花局》再到今天的《大地之上》,都洋洋洒洒地照着现实主义小说文本本理应具有的民族内涵与民族信念,作者经常是很用心地将古典小说的叙事方法与形式,妙趣横生地转化成现代小说的当下呈现,取得的成果相当喜人。他的《大地之上》,依旧借鉴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开阔叙事风格,还有机地穿插了不少诙谐幽默的民谣俚曲,其中有最让人记忆深刻的“颠倒语”,当然也有刻意铺陈的“大实话”。小说擅摸的某些意向和一些复杂的情绪表达,作者常常巧妙地借用一些活泼生动的民间小调来进行宣泄和伸张。作品还很有深意地铺排了主人公李墨喜艰难寻访有可能改变村庄命运的儿子在川会长,并向他娓娓讲述着古老村庄的故事,这种有很浓郁的中国古典小说中话本、传奇以及笔记体小说的特征,都为作品增添了不少的亮点。作者笔下的齐鲁大地上的民情风俗、地域文化,跟跟他之前的小说保持了艺术上的一脉相承,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叙事文本上的游走路径。

“山乡巨变”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是不争的事实,而巨变过程中每一个真实生命具体体验也理应是我们文学要努力去表达的东西。我个人觉得王方晨对这个面与点的把握是颇有心得的,作品中既写了人们在面对大变革时的震撼,同时也以“大地之上”的恢弘意境,诗意地在“写人”这个精髓上做足了文章,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相依为命进行着颇具象征意义的勾连,同时对人物言行的描写,再现了华夏民族的不屈不挠和生生不息,当然这也正是新时代“大地书写”所赋予“大地之上”的诗意所在。

第三届山西网络作家培训班举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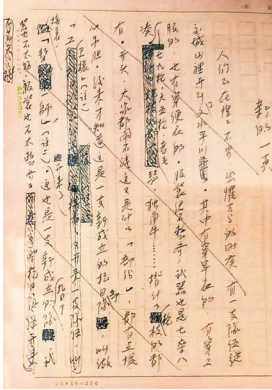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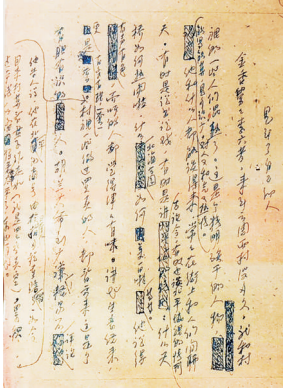
近日,由中共山西省委统战部、山西省作家协会、共青团山西省委联合主办的第三届山西网络作家培训班暨座谈会正在举办。

本次培训邀请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院研究员马季、安徽大学教授、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网络文学研究分会副会长周志雄,分别作了题为《网络文学的大众审美与文学创新》和《网络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的专题讲座。讲座内容涵盖新时代网络文学创新发展状况、审美取向、传播途径、现实主义题材等网络文学创

作话题,引发参训学员的关注和讨论。在之后举行的山西网络作家座谈会上,与会网络作家畅谈了参加培训班的心得体会,分享了网络文学创作中的经验和做法,就创作中的热点话题展开讨论,并针对网络作家权益保护有关问题与律师进行了对话。

参加培训的作家们认为,本次培训对认识网络文学的发展规律和价值取向,对自己下一步进行网络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今后要把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注入网络文学创作中去,创作出紧贴时代的精品力作。

晋 阳



《刘胡兰传》手稿

今年是马烽诞辰100周年,北京、太原、汾阳举办多场活动纪念这位人民作家。在这些活动当中,由中国现代文学馆、山西省作家协会在太原市图书馆联合举办的“扎根吕梁 扎根人民——马烽百年诞辰纪念巡展”别具特色。这是马烽手稿、书信和写作用品的一次集中呈现,人们可以近距离对马烽的创作世界有更为具象的了解。那些反映山西农村、倾吐农民心声的作品如何诞生?又是怎样深深烙印在读者心中的?走进巡展,便可窥知究竟。

步入太原市图书馆太图书馆展厅,马烽使用过的名章和钢笔等物品,醒目地呈现在眼前。墙上是一页页手迹和一幅帧老照片,按时间顺序把马烽的创作生涯梳理出来。这是展览的第一部分,彰显马烽的“人民情怀”。

在《忆童年》《军旅生涯》《延安学艺》《扎根吕梁山》等散文手稿前驻足欣赏,可以看到泛黄的稿纸上,马烽的字迹流畅洒脱、古朴清雅,不少地方有修改和圈涂的痕迹,显示出他严谨细致的作风。这些体现创作思绪的文字,带我们回顾了他走上革命道路的过程。战斗和生活的磨炼是他第一笔宝贵的创作素材。从此,他便与人民并肩同行,把书写人民作为一生的创作追求。

“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一次深入生活调查研究的极好机遇。增长了农村社会知识……对我后来从事农村工作,从事反映农村生活的文学创作,也打下了一个基础。”记录在崞县参加土地改革工作的这段文字,是马烽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观最直接的体现。

介绍《吕梁英雄传》创作时,马烽写他和西戎“俩人花了十多天工夫,总算大体写出了一份提纲。拟定了主要人物的姓名、性格、相互关系等,给每个人写了一份简历……还画了一幅简要地图。”不难看出,马烽与西戎严谨认真的创作态度以及创作方法。

《我的第一个上级》创作于上世纪50年代,原稿上改动不小,但字迹依旧清晰,删减部分框了起来,用斜线像网一样遮住,体现了马烽创作之用心。这篇文章得到茅盾的高度评价:“老田这个人物,写得龙拿虎跳,在马烽的人物画廊中,无疑是数一数二的。”

不少反映马烽深入群众的老照片引人注目,其中一个画面是马烽手里攥着一颗土豆,蹲下身子与灵丘县大北沟村农民话丰收的情景,此时的马烽已经64岁,双目炯炯有神,脸上露出质朴、爽朗的笑容,与农民没有半点区别。这一时期,马烽佳作频出,与他扎根群众密不可分。

来到第二部分“乡村蒙太奇”展区,一份份年代久远的刊物、电影海报等资料照片直观地展现出马烽电影剧作的特点。“我所以热衷于写电影文学剧本,其中有个缘故:我历来都写农村题材的,我心目中主要的读者对象就是农民和农村干部。但是我发现农民读小说的为数并不多。由于电影事业的发展,这种艺术形式拥有大量的农村观众,这是小说作品无论如何赶不上的。”马烽对于电影剧本这一创作形式的理解,是他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观的又一体现。他始终关心农民的精神需求,农民喜欢哪种形式的文艺作品,他就用哪种形式去创作。

《山村锣鼓》以这样的文字开头:“盛夏,骄阳似火。费成树用小锣拉着他爹费德厚,吃力地路上走着……这是个二十三岁的青年,人样子显得很忠厚,衣服虽然破旧,但仍掩盖不住那点学生气质。他满头汗水,不时抬起手来在脸上抹一把……”两三句话就将读者带入故事情景中,有很强的画面感。这些电影剧本反映出马烽对新时期农村问题和农民命运的关注和思考。

从一名文学青年成长为“山药蛋派”的代表作家,马烽曾与很多伟大的灵魂相遇、相知。第三部分“文坛朋友圈”记录了马烽与老舍、赵树理、沙汀、冰心、巴金等文坛名家交往的点点滴滴。

在北京时,马烽曾与赵树理共事,对赵树理作品的认同、欣赏和钦佩洋溢在字里行间。虽然没和赵树理一起下过乡,但是他追随赵树理的脚步,将自己的足迹留在乡村大地。

马烽、胡正、孙谦、李束为、西戎“五战友”的一组合影放在了展览最后。他们五人一同走过革命年代,见证山西大地的变迁,拥有深厚的友谊,传递出“山药蛋派”文学的精神力量,令人动容。

展览的三个部分完整地呈现马烽为文学事业作出的贡献,给参观者留下深刻印象。有人在留言区直抒胸臆地写下:“马烽老师是山西人的骄傲!”还有人观后感收获:“身为土生土长的吕梁人,从小便知道马烽先生……今日更深刻地了解了‘山药蛋派’,那是一种扎根农村、朴实无华的习作精神。”前辈留下的大文学遗产,令后人受用无比。马烽的精神仍在延续。正如马烽女儿段惠芳说的那样:“一个人,无论他的职业是什么,只要做了有益于人民的事,人民就不会忘记他。”

